

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辽宁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责任编辑：王伟 赵杰 申世英

封面设计：刘 虎

封面题字：沈延毅

辽宁文史资料

Liaoning Wenshi Ziliao

第十七辑

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公安厅印刷分厂印刷

字数：24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0 $\frac{1}{5}$

印数：1—6,000 插图：3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90·209

定价：2.00元

目 录

张学良将军半生事迹浅论·····	郭维城 (1)
回忆西安事变·····	卢广绩 (10)
起用白、刘前后·····	陈大章 (22)
难忘的一九三六年·····	宋 黎 (29)
西安应召·····	韩永赞 (44)
张校长营救我们出狱·····	柳 文 (48)
艳晚事件·····	宋 黎 (52)
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	吴一凡 (67)
积极追求爱国统一的张学良将军·····	刘鸣九 (69)
言犹在耳·····	万 毅 (74)
张学良将军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概述·····	荆有岩 (78)
张学良与于学忠·····	惠德安 (91)
出兵河南时两主将的分歧·····	刘鸣九 (99)
十年戎马紧相随·····	张沛汉 (103)
勤务兵的回忆·····	傅 德 (108)
在张将军身边七年·····	杜兴权 (113)
我所知道的张学良的几位副官·····	张沛汉 (117)
张学良将军的卫队·····	那维张 (120)
——写在前面·····	宋黎、郭峰 (126)
东北军学兵队史实·····	<u>任志远</u> 、卫之 (127)
张学良与东北讲武堂·····	高景生、孟繁宗 (143)

四临洛阳分校·····	郑殿起 (151)
回忆《东方快报》·····	朱焕阶 (156)
热心教育 培植人才·····	罗巨峰 (162)
建立沈阳同泽女子中学·····	李 琴 (170)
在绥中办新民小学·····	杜尚文 (172)
在海龙办新民小学·····	金贵麟 (175)
张学良与东北体育·····	李 生 (176)
重视体育 提倡竞赛·····	郭述汾 (183)

白山黑水忆将军·····	高存信 (188)
往事回忆·····	王振乾 (198)
二进条陈·····	沈延毅 (202)
三见张学良·····	王世述 (205)
少年的回忆·····	宁京起 (207)
轶事二则·····	吴景勋 (209)
几件小事·····	于士洲 (212)
张学良二三事·····	雨 辰 (214)

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纪实·····	鹿钟麟 (217)
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邱秀虎 (226)
雪窦寺囚禁轶闻·····	邵池翊 (251)
张学良台北访沈鸿烈·····	宁修本 (253)
张学良在台点滴·····	赵锡滨 (257)

致信邵汝廉·····	张学良 (263)
我的一家·····	张怀英 (265)

王化一日记选辑·····	王化一 (268)
张学良将军大事记·····	邢安臣、赵锡滨 (298)

张学良将军半生事迹浅论

郭 维 城

张学良一九〇一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适逢我们国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其父张作霖是奉系军阀首领，长期统治东北，屡次问鼎中原。一九二七年任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内阁。一九二八年回师东北时，在沈阳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学良即继任东北的首领，中间经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他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时代，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位特定人物。

张学良自幼聪颖过人，志向超凡，深为其父所爱重，曾聘请社会上和僚属中几位有专门学识的人为他开办私学。除授以经史子集外，还开了许多欧美资产阶级爱国的、民主的、科学的课程。他学习面很广，看书很多，数、理、化、英语都有较好的基础。字写的也很雄健跌宕，清峻洒脱，也很爱好古诗、古画等传统艺术。

中国儒家封建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新兴学说都对他影响很大。他文质彬彬，具有儒将风度，是“学生官”典型。他多思重谋，明敏坚定，主张做正直的人、正义的事；正大光明，开诚布公；一视同仁，无负于理，无负于人；对部属用而不疑，放手信任。他公忠体国，锐意求新；不甘做亡国之奴，励图国家的统一富强。“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加感到国难家仇、孤臣孽子，负疚深重，难以自容。面对严峻的现实考验，促使他不断地探索，并作出历史性的壮举，是合乎其思想和性格发展的。

他所崇拜的历史伟人,有宋朝岳飞、文天祥,明朝戚继光、史可法,清朝丁汝昌;以及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将军,英西海战殉国的纳尔逊将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高尚的品格和志向。相反,其父曾以唐朝李世民期之,日本裕仁勉之,都遭到他严正的非议。

张学良一九一九年在东北讲武堂一期炮兵科毕业后,即任团长、旅长。一九二二年任梯队司令,指挥第三、第四、第八混成旅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一九二四年任军长,指挥第一、第三联合军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一九二六年任军团长,翌年指挥第三、第四联合军团,在河南与北伐军作战。一九二八年,在河北与蒋军对峙。“皇姑屯事件”后,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年底易帜,改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他主张建新军,用新人,军官要年轻、有学历、有知识。他操办东北讲武堂时,招收中学生和有中学文化的军士。其他专业技术军佐和军士也都要通过正规训练。他致力建设诸军、兵种合成部队,办航校、海校,组建强大的航空队、舰队。并加强炮、工、通信等特种兵和军工生产。他强调军队要重视军容风纪,本人着装也很标准(平时喜欢穿便服、西服)。

张学良不仅重视办军事学校,而且重视培养人才,同时拨出巨款,聘请名人,办东北大学,一直到“九·一八”后迁到北平,“双十二”前迁到西安,张都十分关心。张还在东北办过交通大学、同泽中学、新民小学,大力扶持冯庸大学。

张在一九三四年暑期在北平招收了一百五十名大学生,主要是东北大学应届毕业生,参加东北军。一九三六年暑期又在北平招收了近三百名大中学生,大部是进步的“民先”队员,组成“学兵队”,“双十二”后分到部队做政治工作。说明张对青年知识分子和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视。

张一向重视体育工作。东北大学专门开设体育系(后改学

院），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先后举办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中日德三国运动会。刘长春取得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张并曾亲自出钱，使刘参加奥运会。他比较喜欢打网球、高尔夫球，也爱好足球、篮球，由他的卫士队组成的“成城”足球队是武汉、西安的冠军，篮球队也很强。他比较喜欢京剧、京韵大鼓、奉派大鼓。他会跳舞，但不经常跳。这里值得说一下，“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诬陷关于张与胡蝶跳舞的诗，当时曾广为流传，使张终生难以说清。张在出国前有过浪漫生活，还染上过嗜好，回国后，生活非常严肃，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各方面都很简朴。

一九二一年他到日本观秋操时，日方有意向他炫耀日军的威仪，并问他有何观感？他答复说，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

郭松龄是他讲武堂学习时所钦佩的教官，以后又结为莫逆之交。一九二五年郭反奉，他对这件事，于公，同情郭的义举；于私，难违父子情。郭兵败被俘，被就地处决，他是很惋惜的，他主张应让郭出国考察。以后他经常谈及郭，曾说如有茂宸在，东北军的情况要好得多。

一九二八年易帜前，他在政治上曾一度同情“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主张。后因受东北老国民党党员钱公来等的宣传和国民政府派去吴铁城、张继等的争取，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民族、民权、民生思想有所认识。并进一步认识到，不团结不能抗日，不统一不能富强。乃不顾内部外部的一切干扰，坚决改易旗帜，拥护国民政府，实现国家统一。

张学良枪决杨宇霆、常荫槐因素颇多，确因情况紧迫，不得不采取紧急处置。他事后曾说过，如果当时对他们能有另外的办法处置，他不会那样干。他曾一再表示，对他们的家属、家产一律给予保护，对他们的部属一概不予追究。

同年夏，中东路事件中，他曾派两个旅在中苏边境与苏联远东红军作战。开始他认为是地方事件，不致闹大。及两个旅很快被歼后，他自认失策，迅即派出和谈代表，签订“伯力草约”，事件得以较快解决。

一九三〇年春，爆发了蒋、阎、冯中原大战；中国的统一受到威胁。他决定采取“武装调停”，派二十万东北军进关作战，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北平设行营。阎、冯败北，他对阎、冯所部按原建制整编，商震、傅作义、徐永昌、杨爱源以及庞炳勋、孙殿英、石友三等部在序列上均归他指挥，实际仍与阎、冯保持原关系。他对商震这位老同盟会员很尊重，对傅作义坚守涿州很钦佩，对徐永昌这位老资格军人也很尊敬。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最后。石友三一九三一年夏率部叛变，一年后石又到北平活动，他对石还很优容，认为都是国军，不应有地区派阀之分，应致力于维护统一，一致对外。这点很受有识之士的好评，包括阎、冯都认为他公正厚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南京最高当局严令不准抵抗的情况下，日军轻取沈阳，并迅速东进吉长，北进哈尔滨，西进新民。当时留在东北的军队，王以哲旅和黄显声的骑警总队，辗转边战边退回关内，辽东的唐聚五部、吉林的李杜、赵毅两个旅和冯占海部，黑龙江马占山部和苏炳文旅，积极组织抵抗。各地纷起的义勇军，如邓铁梅、苗可秀等部，都曾受到张学良的支持。

张学良没有估计到日本能那么快发动对东北的全面进攻，开始以为可能是如南京方面所说的地方事件。他也没有估计到南京方面完全采取容忍态度，同时他认为抗日战事，必须由国家全盘部署实施。他又过高估计英美出面调停的可能与份量。特别是对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更寄以很大希望，竟同意了在锦州设中立区的主张。及至国联调查团毫无作为的离去，日军进占辽西走廊，他深知东北大势已去。热河战役只进行十二天，

实际是出于应付。但又不甘将国土拱手相让，所以又组织何柱国、王以哲等部在长城线上阻击敌人。加之商震、宋哲元、关麟征、黄杰部队相继增援，战局趋于稳定。东北国土相继沦陷，张学良是难辞其咎的，请求处分，先被免除陆海空军副司令，降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后又一度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主任。不久即被迫出国，由何应钦任代主任。

一九三三年三月蒋介石亲自主持保定会议，逼张出国。当时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对蒋的做法表示不满，曾主张扣蒋说理，西北军将领孙殿英更提出要“造反”，都被张婉言说服。他提出，大敌当前，决不要闹分裂，如果闹分裂，又将加速日军入侵，有人还提出，张出国东北军可能被分裂，张可能回不了国。他认为新整编的四位军长于学忠、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一定能团结好掌握好部队，东北军不致被分裂，他肯定会有机会回国。他开始曾考虑去英国，因为意外长齐亚诺的邀请，蒋同意他到意大利。他在上海仅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不用任何药物，自行强制戒除嗜好，即带家属去意大利。他曾遍游欧洲，增长许多见识，身体也格外健壮起来。

一九三四年初，张乘胡汉民在广州倡议反蒋，由意乘船返抵香港，蒋、胡都派人争取，东北集团的主要成员也都在上海等候，他即离香港到沪。适逢“闽变”不久，张对这一义举深表同情和惋惜。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在“一·二八”淞沪战役后，曾被张任命为一一七师师长。翁的部下方叔洪，“闽变”后投张，一直留在他的身边任参谋。回国后张何去何从，其说不一，他坚决主张做实事不务虚名，因蒋已决定从华北调东北主力到安徽、湖北打红军，张为了重掌东北军指挥权，接受了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职务。

张是好学多思、有见识有抱负的人，面对新的形势，究竟依靠谁领导统一中国、抗日复土？他主张拥护蒋介石作领袖，但不是搞法西斯，而是为了统一，为了抗日，也就是说拥护领袖

是有条件的。同时，张一直没有放弃对英美民主思想的向往。这与康泽、戴笠等搞法西斯，无条件拥蒋独裁是不同的。当然他也不能不在表面有所应付。比如，同意把东北集团的一个秘密抗日组织“复东会”的骨干与康泽、戴笠等合组“四维学会”，但只保持形式，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国民党派到东北军的以曾扩情为首的政训机构，也没有起到实质作用。

一九三五年张主动解散了他在东北军中发展的约二百名以团、营干部为主的青年党组织，即原国家主义派。张叫他们填表集体退党，因为他已认识到青年党的方向、作法都不对，在东北军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只是形式。

面临执行打共产党的这一新任务，他费心思考。他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基本上是北伐时代在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号召下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对国共分裂后，共产党执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路线、方针、政策，搞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做法还不理解，也没有直接和红军接触过。他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首先找出了李大钊案叛变的仍留在东北军的黎天才和黎的助手李鸿鸣、李金洲等人。接着又找到曾经留学苏联在共产党任过要职的潘文郁（冬舟）、吴志忠帮助他搞些资料，讲讲理论，他经常同潘文郁长谈。

东北军调到鄂、皖，红二十五军已向陕西转移，仅与一一五师打过，部队损失不很大。其余部队很少与红军接触。这一时期张一面广泛接触了国民党阵营一些要员，以及社会上包括东北集团的一些名人，一面潜心学习，一面认真思考中国的出路和抗日复土的大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又亲自到上海找李杜，访服刑中的杜重远，并希望能直接找到共产党的代表。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指向陕、甘。蒋介石决定调东北军主力到西北，并组成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代总司令。部队陆续调入，张于九、十月几次到陕，西北“剿总”十一月正

式成立。东北军入陕不久，一一〇师在劳山被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被打死。张学良、王以哲受了很大震动。接着，榆林桥战役一〇七师被歼灭一个团，直罗镇战役一〇九师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战死。更使张不能不进一步深思内战的后果，抗口的前途。当然，损兵折将对张有影响，但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影响，这是外因与条件，不是内因与根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并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口号。同时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这些对张的思想有极大的触动。加之红军在前方极力加强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地下党也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张学良到西北后与精明干练、有革命传统和斗争经验的杨虎城将军推心置腹，结成生死之交，所以才促使其改弦更张。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先后派李克农、周恩来与张学良相继举行了“洛川会谈”、“延安会谈”。周与张两人间，开诚相见，竟夜长谈。对于和共产党谈判，张认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大敌当前，不同的意见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国民党中央既可以在后方与共产党谈判，东北军也可以在前线与共产党谈判，他是为抗日大计而谈，是主张“逼蒋抗日”，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先斩后奏”。

“西安事变”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末的西安，由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确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

北伐中途，国民党背离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悍然举全国的力量“剿共”，置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于不顾。继“九·一八”不抵抗、“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对日退让再退让，对红军实行五次围剿，万里追截。对任何主张抗日的力

量，包括十九路军、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以及华北、西北、西南等方面，都采取压制的办法；对华北及各地的学生运动，残酷镇压。《新生周刊》因登《闲话皇帝》而判主编杜重远以徒刑，囚禁“七君子”，暗杀杨杏佛。日军侵绥，张几次请求出兵增援，均遭申斥。甚至“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也不准召开，确实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倒行逆施，不一而足，大大失掉了人心军心。要求团结抗日，已是全国人心所向。

红军长征虽然遭受很大损失，但锻炼得更加坚强，陕北根据地是巩固的，全国各地抗日烽火是扑不灭的。而当时国民党统帅部，竟头脑发胀，认为红军很快可以被消灭，趁机把国民党精锐部队，包括装甲兵、航空兵（用棉麦借款买的飞机），大部调集西北。在作战部署上，把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摆在第一线，而前敌总指挥由万耀煌担任，显然是采取对阶级异己、派系异己“一勺烩”的办法。一场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亲痛仇快，宁有逾此。

张、杨完全是从抗日大计、民族安危设想，对蒋一直主张采取谏诤的办法，蒋在洛阳祝寿时，张曾独自驾机前往，大胆指出，时至今日蒋再这样一意孤行，将成为独夫民贼，袁世凯第二。其用心良苦，胆识可佩。而蒋竟无动于衷，不久即亲临西安布阵督师。十一日最高军事会议结束，十二日开始行动。值此时机紧迫，千钧一发之际，张、杨两将军采取断然行动，能不信服完全是形势、时机使然，历史逻辑使然，而决非两人的鲁莽行动。

张、杨从始到终，确无杀蒋之蓄意。临潼捉蒋时即经过缜密的部署，只准捉活的；一度将蒋迁至高桂滋住宅，更是出于对蒋安全的考虑；张还把最亲信的随身副官于锦文派去照料蒋。

捉蒋，共产党事前是毫无所知的，放蒋，周恩来副主席起了重大作用，是和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一致的。捉蒋后，在西安组成了“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

委员会”以及“联合办公厅”、“联合参谋团”，实现了“三位一体”，密切合作。

放蒋是在谈判完全达成一致意见，蒋不仅完全同意了六条协议，而且确定了拨给善后经费的数额；特别是西北局势已定，蒋又一再表示决不翻悔，宋美龄、宋子文、端纳及其背后基本的力量全力担保的情况下决定的。在这方面，蒋百里、邵力子两人的意见，也是有影响的。那几天，张不断绕室盘桓，终于下了早放亲送的决心，张认为晚放不如早放，既放之则送之，送的后果不一定比不送的后果更为严重。而且张也确实同于学忠、王以哲作了短时期回不来的缜密部署，坚定维护“三位一体”的关系。他却没有料到祸生肘腋，王以哲竟被张的部下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人杀害。于学忠虽忠心耿耿，但对团结其他几个军，却束手无策。以致东北军很快被分裂，先调河南两个军，安徽两个军，随后六个军都由国民党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张也就失去了回来的条件。张听到王以哲被杀害后，在给于学忠的信上写道：“闻悉王鼎芳遇害，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周恩来等同志亲率中共代表团成员赴王家吊唁。二月四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王家属唁电：“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

总之，“西安事变”是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伟大的转折，是符合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的，张学良将军的功绩是千古不能磨灭的。

回忆西安事变

卢 广 绩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了十年之久的内战，对当时的国家安危与民族存亡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也是个伟大转折。我曾亲身参与这次事变，现就记忆所及，拙笔记实。

事变的远因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大部撤入关内，大批东北青年学生和有志之士纷纷流亡到关内各地。到一九三六年他们离开故乡已经六年了。他们和东北军抗日复土愿望一年甚于一年。作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虽奉蒋介石之命对日军侵略未作抵抗，但他的心情却与东北同胞是一样的。

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立意要消灭共产党，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扬言三月之内剿灭共产党和红军。一九三三年张学良出游意大利，于一九三四年春从国外回来，曾竭力拥蒋，东北军被派去“剿匪”，与红军两次较量，结果精锐部队一〇九师和一一〇师几乎全军覆灭，两师师长何立中和牛元峰均战死。这两次损兵折将的教训震惊了张学良及东北军官兵，使他们头脑逐渐清醒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由国外考察归来，到西安后，时与张学良将军谈到抗日救国和东北军今后向何处去等问题，张对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开始怀疑。加以蒋介石对东北军被红

军打垮的一〇九师和一一〇师的番号不予恢复，对作战时所消耗的给养弹械不予补充，东北军一切待遇都同国民党中央军相差甚大。由此，张已看到蒋介石命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使两方相拼而他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的阴谋。但当时对蒋还抱有幻想，认为国民党中央军拥有实力，乃是抗战的主力。因此张想尽力说服蒋介石，使他共同抗日。

张 杨 合 作

杨虎城是陕西省蒲城县人，出身贫苦，思想比较进步。当时他任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即西北军）军长。张学良率东北军到西北时，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张学良丢了东北，现在带二十万大军到西北，将来西北必成为张的势力范围。”故张杨初见，双方各存疑忌。杨虎城后来曾对我说过：

“张副司令来西北，虽有中央的命令，但初时我并不欢迎。甚至有人给我献策，采取类似后来“西安事变”那样的行动来对付副司令。我邀集陕西地方士绅商议，其中有张凤翔、王典章、康继尧、刘治洲等人。大家都说，一九二九年我们陕西关中区遭大旱，死亡枕藉。那时，朱子桥将军到东北劝募，张学良等东北各界人士曾赠银洋五十万元，还救济粮食若干列车，陕人多得益处。现在他们因东北被日敌侵占，背井离乡前来西北，正是感恩报德的机会，应该表示欢迎。”杨虎城听了后，思想有所转变，但张杨之间的隔阂尚未完全消除。

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怀有抗日救国之心，并各自私下与共产党、红军有联系。一九三五年底，高崇民来到西安，高也知张与杨之间嫌隙尚未尽消，经上海有关进步人士介绍，通过杜斌丞会见了杨虎城将军。高转达了张愿与杨携手抗日的心意，将张杨的共同利害直言陈述于杨。崇民快人快语，与杨谈得十分融洽。为了宣传鼓动抗日，高崇民、栗又文和地下党人孙达生共同编写了“活路”小册子，文章写出后，无处印刷，杨虎城

应允由十七路军印刷厂秘密印出。“活路”是东北人所写，宣传对象也主要针对东北军，却在杨虎城所属十七路军印刷厂印出，由此可看出张杨已开始初步合作。

“剿总”的内部情况

我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就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长的职务。八月下旬，张学良电约我赴西安。张接见我时说：“我们东北总部内部，新旧老少间近来意见分歧，互不团结，很不好。希望你来后能做些团结工作。”这样我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初到西北总部就任第四处处长，同时兼管“新生活俱乐部”和“大陆周刊社”两个机构。

西北总部下设办公厅和八个处。八个处分别为第一、二、三、四处和粮秣、交通、军法及军医处。参谋长是晏道刚，秘书长为吴家象，办公厅主任为米春霖，副主任为洪舫。一处处长为徐方（管军事），二处处长为闵湘帆（管军需），三处处长为马效寒（管总务），四处处长为卢广绩（管行政）粮秣处长为张政枋，交通处长为蒋斌，军法处长为赵鸿鸪，军医处长为任作楫。除晏道刚、徐方、闵湘帆是蒋派来的，余均为张所引用的旧部。另外还设有一个政训处，处长为曾扩情，该处虽名义上隶属于西北总部，实为蒋之特务系统。

我到西安不久，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来“西京招待所”访我。他也忧心忡忡地谈到东北军内部情况，他希望我不要到总部来搅进去。王是我老友，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张将军所谈确有其因。

蒋介石到西北

我到西北总部任职后不久，有一天看到一份“国内军政通报”，内云：广西问题已得到和平解决，过去开往西南去打桂系的国民党中央军，将不再留驻西南而调出。当日晚，我在